

社会文化语言学“指示原则”与国家形象构建^{*}

——以习近平联大演讲为例

张虹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提 要: 本文以习近平在 70 届联大上的演讲为语料, 基于社会文化语言学中的“指示原则”, 探讨如何通过话语构建国家形象。研究表明, 演讲者通过隐含与预设、评价话语、经典话语和直接标识 4 种语言手段成功地将中国构建成“世界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有担当、负责任、着眼于全球共同发展繁荣的国际型国家”的国家形象。

关键词: 国家形象构建; 指示原则; 社会文化语言学; 政治话语分析; 习近平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7)03-0017-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3.004

China's Country Image Projection from the Indexicality Principle of the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Speech at UN

Zhang Ho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Language is the most basic and important means of country image projection. However,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has not been applied to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indexicality principle of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Xi Jinping was trying to project China's image at UN General Assembly as a country that is dedicated to building world peace, contributing to global development, uphold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 country that takes the world's common prosperity as her goal. Xi Jinping achieves his objective by means of presuppositions and implicatures, covert evaluative statements, ideology-laden linguistic structures and overt labeling.

Key words: country image projection; indexicality principle;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Xi Jinping

1 引言

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 国家形象的传播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和穿透力强等特点。国家形象是国家重要的无形资产, 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 不仅影响国家的国际威望和声誉, 而且能够提高本国民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孙有中 2002,

2009)。世界各国大都将国家形象构建作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国际上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30、40 年代, 我国对相关问题的关注起步于上世纪 90 年代, 近期渐成热点。不同学科, 特别是传播学和政治学共同参与研究的局面已经形成。遗憾的是, 语言学界参与这一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2015MZD011)子课题“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国际比较及其国际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得到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的支持, 文秋芳教授和黄国文教授对文章悉心指导, 从选题、文章整体架构到内容和文字表述多次提出宝贵建议, 成文后又经刘润清教授审阅和润色。李民副教授、董希骐副教授均对文章进行审校, 在此谨表衷心感谢。本文作者系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域的研究者寥寥无几。话语是构建国家形象最基本、最重要的媒介,通过话语方能使国家形象落到实处。(文秋芳 2017) 忽视对话语这一关键媒介的分析,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就成为空中楼阁。因此,有必要从语言学理论视角探究国家形象的构建途径。社会文化语言学理论(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是近年出现的语言学理论新流派(Bucholtz, Hall 2005) 现阶段多用于个体身份构建的实证研究(Bucholtz, Hall 2005; Yuan 2016)。笔者认为,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国家形象构建的研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选取“指示原则”(Indexicality Principle),以习近平在70届联大上的演讲为语料,展现社会文化语言学理论用于国家形象构建研究的可能性。

2 指示原则

“指示原则”揭示通过语言手段表达说话者本人或他人身份的途径。具体包括:(1)直接标识;(2)隐含与预设;(3)评价话语;(4)隐含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经典话语(以下简称经典话语)。

直接标识一般采用“X是Y”的表述方式。其中有正面标识,例如,“中国政府认为柬埔寨是中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巴基斯坦是中国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有负面标识,例如,小布什将某些国家贴上“邪恶轴心国”标签。在直接标识身份后,说话者会在后续话语中通过语言详述(linguistic elaboration)对构建出的身份做进一步阐释,即通过使用特定的谓语、定语和状语等进一步提供支撑信息。比如,在中巴同意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中方重申,“始终把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先方向,感谢巴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一贯给予坚定支持,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其中,“始终”、“优先”、“感谢”、“一贯给予”、“坚定”、“继续坚定支持”这些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的使用进一步解释和支撑“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身份,意味着:不管什么时候、不论风云如何变幻,两国都是密切而友好的。双方互相支持,是国家关系的典范。这种直接标识身份的做法使听众更易加工说话者传达的信息,对标识的身份更易理解。

在特定语境中,说话人也可采用隐含与预设构建自己或他人身份。比如,人称代词的使用,其确切含义必须依靠具体语境来确定。例如,“我们”可分为包含型(inclusive we)和排除型(exclusive we)两类。使用包含型的“我们”意味着说话

者愿意将听话者与自己置于同一群体中,拉近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排除型的“我们”则意味着说话者不愿将(部分)听话者纳入自己认可的群体,采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顾及被排除在外人群的面子,但排除性的“我们”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有时会伤害被排除人的面子。如,“我们派往外国的维和部队都是经联合国批准的”,言外之意,预设着有的国家派兵他国是未经联合国授权的。

在锚定交际立足点和交际者角色的同时,说话者还可选用评价性话语,明确立场和取向,将说话者和听话者置于互相参照的情境中,表达自己对他者的认可或不认可,进而构建身份。例如,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在70届联大演讲中讲述达伊沙(Daesh)的恶行:“达伊沙正在对世界人民、诸多家庭和社区造成毁灭性的伤害,破坏世界遗产,恶劣地违背国际法和基本道德。这种行为不能被允许占上风”。澳大利亚通过这种评价性话语,传达自己不认同以达伊沙为代表的恐怖组织的态度以及与其对立的立场,树立澳大利亚主张维护正义、公平的国际秩序的形象,同时,也构建了达伊沙恐怖组织的形象。

经典话语包括谚语、典故、成语和名人语录等。可引用经典话语来构建身份。引用又分为“明引”和“暗用”(陈望道 2008),前者即直接引用,后者是将经典话语融入自己文中,不用引号。Fairclough(1988)曾对媒体话语的表征形式加以分类,指出说话者对其所说内容的精确性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感。直接引用意味着说话者对所引内容的准确性负有最强的责任感(Buttny, Williams 2000),向听众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信息。比如,习近平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直接引用“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此典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意思是,如果用清水来给清水增加味道,谁能喝得下去?如果只是一琴或一瑟,谁能听得下去?并得出结论“同之不可也如是”。“和”与“同”表面上看很相似,实质上大异其趣。“以水济水”和“琴瑟专壹”为同,是绝对的一致,既无变动也没有多样性,因此它代表单调、沉闷和死寂。通过此典,表达中国在处理关系问题上倡导“和而不同”的态度,即和睦,但不求一致;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进而构建出中国“包容、合作”的国家形象。

以上4种构建身份的路径可采用不同层次的

语言实现形式,即词汇、短语、句子或语篇等,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情境性。恰当使用这些手段可以增强自我或他人形象构建的有效性。

3 中国形象的构建

3.1 国家形象

国内外文献中对“国家形象”(country image)的定义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指国家的自我形象(self-projected image),即某国自己塑造或正在努力塑造的国家形象(也称作国家身份)(Rusciano 2003);另一类指国家的他者形象(perceived image),即某国在世界其他国家所被感知的国际形象(Bennett 2005; Buhmann, Ingenhoff 2015; 孙有中 2002, 2009)。本文所说的国家形象属于第一类,指本国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外构建的国家身份。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演讲稿共3,026字,25个段落,分为4个部分。其中,1-5段回顾历史,肯定世界各国人民取得的成就,凸显中国对二战胜利做出的贡献,体现对历史的尊重。6-18段紧扣“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提出中国方案。19-23段阐述中国为落实这一方案所将采取的实际行动。24-25段再次与主题呼应,号召世界各国为落实这一方案共同奋斗。

3.2 指示原则的运用

本部分依据指示原则的4种途径,按演讲内容顺序,依次论述隐含与预设、评价话语和直接标识3种手段对国家形象的构建。因经典话语贯穿全文,故置于最后一节讨论。

3.2.1 隐含与预设

人称代词是隐含与预设的主要方式,使用人称代词可隐性构建国家形象。习近平在演讲开篇回顾联合国的70年历史。他讲道:“70年前,我们的先辈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70年前,我们的先辈以远见卓识,建立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70年前,我们的先辈集各方智慧,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里的“我们”是排除性的,排除法西斯国家,而包括中国和其他反法西斯联盟国家、联合国成员国、以及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国,从而与这些国家拉近距离,建立求同存异的话语基础。这句话的隐含与预设是: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站在一起的,是合作

伙伴,是战友,是朋友。我们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者”和“贡献者”、联合国的“建设者”、“联合国宪章”和国际秩序的“奠基者”和“维护者”。这是在构建国际反法西斯大家庭正面形象时,将中国隐含于其中。这种话语基调宏观大气,突出各国的卓越贡献,使自己的正面形象低调隐含其中。此种构建国家形象的方式营造友好气氛,也容易被听众接受。

从第九段到十七段,习近平使用7次完全包含型的“我们”,把在场的各国都包含在内。他说道:“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里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发出5点倡议,希望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能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境5个层面共同努力,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使用一方面表明中国首先要求自己做负责任的担当者和实践者;另一方面表明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号召每个国家都能遵循上述5点倡议,使得整个世界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维护国家间和平公平正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迈开洋溢着中国智慧的脚步。

3.2.2 评价话语

第九至第十八段多次使用“要……,不……”、“是……,不是……”、“应该……”、“不能……”和“坚持……,不搞……”等句式来表达中国对一些国际事务或他国做法的评价、认识、立场和态度,进而构建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形象。例如,“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等等。此类句式中通过“要……”、“是……”、“应该……”、“坚持……”等引出中国的主张;而“不要……”、“不是……”、“不能……”和“不搞……”等则引出中国对世界上某些不正义行为所持有的立场和态度。“要……”和“是……”等隐性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不是……”和“不能……”则暗含着有的国家在做这

些不正义的事情,比如,“搞单边主义”,“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和“以富欺贫”等,隐性构建当今世界上个别国家的“强权、霸道”形象。这种评价话语表达出中国与其它国家的相处之道及其倡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国家形象通过这一方式在演讲中得到充分展现。

3.23 直接标识

习近平在第二十至第二十二段以明确的身份范畴标识中国形象,比如,“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即构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形象。从前文可以看出,中国不仅是国际秩序的“奠基者”和“创建者”,还将继续维护这一秩序,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这一积极的国家形象早在70年前就已形成,至今仍未改变,在将来还将继续得到维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发展中国家”是亚非拉国家的本质特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这一身份的坚持中表明自己将永不称霸,与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建立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将是中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整个世界承担的道义责任,这一点在本段演讲中通过直接标识的指示手段表达得十分清晰。

在第二十三段,习近平通过语言详述的方式与20-22段中构建的国家形象进行呼应,阐述中国将如何付诸行动。习近平在第二十三段使用3个“我宣布”,并在每一个“我宣布”之后,借助一系列表达积极意义的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例如“支持”、“促进”、“作出新的贡献”、“加入”、“率先组建”、“建设”和“提供无偿军事援助”等,阐明中国为落实相关方案将要采取的具体行动。这些行动与上文中用话语直接标识的国家形象相呼应,提供重要的支撑信息。第一个“我宣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对应“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的形象;第二个“我宣布,……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对应“世界和平的建设者”的形象;第三个“我宣布,……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对应“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形象。

3.24 经典话语

经典话语亦可构建身份,本文以典故为例加以说明。典故能用经济的表达手段传达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使用过程就是主体的人对理解对象的客体进行意义赋值的过程(王晓军等2015),其

中不仅包含伦理规范和道德信仰,且蕴藏着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

贯穿演讲全文,习近平多次引用中外典故来呈现中国的意识形态,时而直接引用,如“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出自《国富论》)(第十三段);时而暗用,如“以史为鉴”(出自《旧唐书·魏徵传》)(第五段)、“穷兵黩武”(出自《明史·范济传》)(第十一段)、“化干戈为玉帛”(出自《淮南子·原道训》)(第十二段)和“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五段)等。有时,他通过平实话语来阐释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例如“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的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的观点即衍生自《论语》中“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的典故。囿于篇幅,本文对中外典故各举一例来阐述习近平是如何借助这种途径呈现意识形态、进而指示国家形象的。

第八段开篇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切入主题“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典出自《礼记·礼运》,体现出一种美好的向往,希望在大道施行的时候,能够形成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尽管这个愿望在战乱时期不可能实现,但反映出儒家学者在乱世中的美好愿景。这是整篇演讲中为数不多的明引。习近平直接引用上述典故来支撑自己的政治观点,隐性表达自己对这一典故内容的认可(alignment)。其目的是表明中国倡导和拥护“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和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贡献给全世界,构建中国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除引用中国典故外,习近平在第二十四段还引用《圣经》中的典故“铸剑为犁”。“铸剑为犁”是《圣经·旧约》中对未来太平盛世的描述(见于《以赛亚书》2:4《弥迦书》4:3):“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习近平通过引用《圣经》典故表达中国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隐含表达中国对维护国际秩序所持有的态度,向听众传达自己赞同这一典故的思想。另一方面,这一典故更能被受《圣经》文化影响的听众理解和认同,更具亲和力,隐性地向西方国家传递不冲突、不战争的和平观。中国借此来宣扬“铸剑为犁、永不再战”的理念,树立自己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形象。

4 结束语

本文借助社会文化语言学理论中的指示原则,从微观到宏观深入分析习近平的联大演讲稿,揭示国家形象构建的 4 种语言实现途径:隐含与预设、评价话语、经典话语和直接标识。研究发现,习近平将中国的形象构建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有担当、负责任、着眼于全球共同发展繁荣的国际型国家”。演讲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以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与世界各国紧密关联,并被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中,具有关注全人类的博大视野。这些形象贯穿于演讲始终,与中国历史上树立的国家形象以及未来要塑造的国家形象一脉相承。

习近平的演讲内容十分丰富,囿于篇幅,本研究仅尝试运用社会文化语言学中的“指示原则”分析国家形象构建,因此,分析不够全面。将来的研究可以尝试运用这一理论的其它原则或其它语言学理论展开相关研究,亦可用此原则分析其他国家的形象构建。要在国家形象构建方面有意识地运用语言学领域的理论,让语言学研究切实为国家服务,也让国家形象构建更加落到实处。同时,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传统、现实状态、意识形态、地域格局迥异,话语构建国家形象并非易事,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积极开展话语构建国家形象的国别比较研究,了解各国国情和话语体系的差异,帮助我们有针对性地在不同国家有效地构建形象。最后,期待更多语言学界的研究者参与到话语构建国家形象的研究中来。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话语构建国家形象研究的持续深入,中国必定会以卓越的姿态和积极的形象屹立于国际社会。

参考文献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孙有中. 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 国际论坛, 2002(3).

孙有中. 解码中国形象[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文晓芳. 拟人隐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评析习近平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J]. 外语学刊, 2017(3).

王晓军 孟凡艳 孟庆梅. 英汉语义词格对比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6.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Bennett, W. L.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M]. New York: Longman, 2005.

Bucholtz, M., Hall, K.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J]. *Discourse Studies*, 2005(7).

Buhmann, A., Ingenhoff, D. The 4D Model of the Country Image: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J].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15(77).

Buttny, R., Williams, P. L. Demanding Respect: The Uses of Reported Speech in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Interracial Contact [J]. *Discourse & Society*, 2000(11).

Fairclough, N.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in Media Discourse [J]. *Sociolinguistics*, 1988(17).

Rusciano, F. L.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 23-nation Study [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3(56).

Yuan, R. Understanding Higher Education-based Teacher Educator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Perspective [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16(44).

定稿日期: 2017-03-13

【责任编辑 谢群】